

《新历史教科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

卞修跃

内容提要 本文对 2001 年 4 月 3 日由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获得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宣扬错误史观、掩饰日本国家侵略罪恶,进而反映战后日本国家错误历史认识的表述和企图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并试图对日本国家错误的历史认识的形成原因进行初步的探讨。文章认为:战后日本社会对其侵略历史的错误认识,是有着历史基础、思想基础、国际环境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是与战后几次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和不久之后其对日政策的改变以及日美同盟关系的确立和固化、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清算不彻底、战后日本国家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重建过程中对各种有利因素的充分利用、战后日本国内经济的恢复及其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近期日本国内大国主义思潮的盛行及经济状况的不景气和政治局面的动荡,以及亚洲邻国对日本这种趋势发生发展的相对无力的应对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日本历史教科书 历史认识 战争责任

2001 年 4 月 3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由 8 家出版社送审的将于 2002 年 4 月开始采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修订版,全数经审定“合格”,获得通过。其中包括由扶桑社送审的、由日本右翼团体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员主导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版本。此次获得通过的8家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对日本近代侵略历史的认识上表现出很大的倒退和右倾,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歪曲历史事实、淡化日本国家侵略战争罪行、推卸战争罪责的严重问题。尤其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更是全面地歪曲日本国家近代侵略历史事实,蓄意美化日本国家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极度淡化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掩盖日本国家军队在海外所犯下的极端暴行,大肆宣扬“皇国史观”和侵略有功理论,公开为曾给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军国主义举幡招魂。因此,引起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朝鲜、韩国等曾经饱受日本国家及其军队侵略蹂躏的国家及其人民的严重关注和强烈愤慨。亚洲国家对日本政府蓄意放行存在严重问题的历史教科书、纵容右翼新编教科书出笼、公然为其国内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潮张目的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然而,日本政府对于来自于亚洲各国的批评,一直采取推诿搪塞的做法,对中国、韩国等国家依历史事实对“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撰的《新历史教科书》所提出的批评和修正意见,以诸如“教科书中没有对某些事实加以记述不能认为是史实的明显错误”、中国、韩国等“提出的很多批评属于史观方面的问题,而政府无权干

《新编历史教科书》的作者是:代表执笔者西尾干二(电气通信大学名誉教授),监修为伊藤隆(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大石慎三郎(学习院大学名誉教授)、高桥史明(明星大学教授)、田久保忠卫(杏林大学教授)、芳贺彻(京都造形艺术大学学长了),执笔者为小林善纪(日本著名漫画家、《战争论》及《台湾论》等连环漫画书籍的作者)、坂本多加雄(学习院大学教授)、高森明勅(国学院大学讲师)、田中英道(东北大学教授)、广田好信(北海道札幌市西陵中学校教谕)、藤冈信胜(东京大学教授)、八木哲(静冈县藤枝市立高洲中学校教谕)、谷原茂生(栃木县今市市立豊冈中学校教谕)和伊藤隆。见〔日〕扶桑社版《新编历史教科书》(市贩本)版权页“著作关系者”。

涉民间史学家的史观”等理由而全部加以拒绝。2001年6月10日,《新历史教科书》(市贩本)由株式会社扶桑社出版发行。10天之后亦即6月20日,又第二次印刷发行。与此同时,日本学校采择2002年度教科书的工作也全面展开。8月7日,日本文部省继多家私立学校明确表示采用该版本历史教科书作为2002年度中学历史课程用书后,又批准了多所公立残疾人学校采用该版本教科书作为2002年度历史课程用书的申请。8月8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工作大楼被人纵火焚毁。迄于8月15日,日本学校2002年度教材选用工作全部结束,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没有被全国公立初中的542个选定地区的任何一个地区采用,需用数量为542册,占2002年度初中历史教科书需用总数的0.039%,远远低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所确定的10%的选用率的目标(约13万册)。

那么,引起亚洲各国人民、包括日本国内一大批正义人士高度关注并强烈批判的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是如何反映近代以来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它所宣扬的是怎样的一种历史观?日本国家和政府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认识与这一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关系?日本国家战后历史认识的形成又是由哪些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本文即拟就上述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一简单的探讨和评论。

上述两事件分别见于中国中央电视台1套2001年8月7日、8日晚7时开始的《新闻联播》节目。

据“日本孩子与教科书全国21世纪网络”事务局2001年10月18日公布的《“编纂会”教科书的采择状况》。资料由该网络事务局长、家永三郎历史教科书后援会会长、著名的历史教科书研究专家^{〔日〕}藤义文先生2001年10月3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作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学术讲演时提供。

一 歪曲事实、掩饰日本国家侵略罪恶的历史教科书

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目前正以“市贩本”的形式公开出版发行的《新历史教科书》，与其被称作“白皮书”的送审本相比，虽然依据文部省的137处审核修正意见做了一些修改，但是，它在记述日本近代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对日本国家侵略历史事实的歪曲掩饰、对日本国家战争罪责的推卸、对侵略战争的美化和对“皇国史观”的宣扬，并未由此而发生本质的改变。因此，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都认定这一版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不论是在史实的记载方面，还是在史观的表述上，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也即是说，这一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本质上是一部违反历史科学精神、歪曲历史事实、宣扬错误历史观、推卸日本国家侵略历史责任的教科书，是一本为曾经遭受日本国家侵略伤害过的亚洲国家及其人民所无法接受的、与国际共识公然对抗的教科书，是一本必须加以完全否定的教科书。

在《新历史教科书》中，书作者不仅蓄意回避了日军强征中国、韩国等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侵华日军七三一细菌作战部队、日军在华“三光”作战等在1997年版的7家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过不同

根据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教科书的审定是由文部科学省教科书审查官和学者们组成的审议委员，特别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申请审定的图书使用不写出版社、作者名的白表纸本，被称为“白皮书”。按照审定原则，文部省不公布审查中的“白皮书”。但是，在递交审查申请后，扶桑社的职员们就拿着白表纸本到学校给教师们看，进行违法的事前宣传，寻求教师们的支持。

程度明确记述的问题,表现出了对以西尾干二、藤冈信胜等人为首的日本右翼学术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自其成立伊始所公开宣称的要从日本各类学校所采用的历史教科书中彻底删除有关从军慰安妇、七三一细菌部队、南京大屠杀等日本国家军队海外丑恶暴行之记述的意图的完全执行,而且,书中还对日本国家自近代以来对外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及与此相关系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全面的歪曲记述。这里,我们就根据该教科书送审的“白皮书”本和目前正在日本国内广泛流行的“市贩本”中关于日本自近代以来对外关系历史的记述,考察一下它是如何对有关日本国家在近现代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发动并给这些国家及其国民带来巨大的民族牺牲的侵略战争历史的重大史实进行否认和歪曲的。

在记述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殖民侵略及这些国家的对应时,这本教科书不仅不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作认真的分析,不对中国等遭受列强侵略的亚洲国家及其人民的自强图救运动给予公正的评价,反而基于对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认同的立场,把西方国家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发动的武装侵略战争,一律表述为“进出”。而且,关于近代亚洲国家之被欧美列强侵略历史的认识,该教科书的“白皮书”送审本原来的表述是:日本“对列强的武力威胁反应敏锐,转变国策开始学习西方文明。但是中

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在1997年版的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东京书院、大阪书院、教育出版、日本书籍、日本文教出版、清水书院和帝国书院七家版本全部都有明确的记述;关于侵华日军七三一细菌作战部队及其所进行的“人体实验”,教育出版一家版本上曾有明确记载;关于日军在华“三光”作战,在1997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书院、日本文教出版和清水书院等5家版本也都曾有明确的记载。见步平《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一文,《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日)西尾干二等编著:《新しい历史教科书》(市贩本)(以下用中译名《新历史教科书》),株式会社扶桑社2001年6月版,第170、171、173、174等页。

国和朝鲜两国……固守传统的中华思想,抱着看轻日本的态度,没有和日本一样对列强的威胁采取积极的对策”。经过文部省审核后,在“市贩本”中修改为:日本“对列强的武力威胁反应敏锐,转变国策开始学习西方文明。而中国和朝鲜两国……面对列强的威胁没有采取充分的对策”。虽然在表述中反映出的对中国和朝鲜的指责相对淡化了一些,但根据它这种表述所隐含的逻辑,则必然在日本的学生中导致出日本之所以在近现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战争,其责任应归咎于中国和朝鲜,而不在于日本。

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方教科书中一般被称作“日清战争”。它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走向对外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的开端。对于这场战争的性质,“白皮书”原先的表述是:“日清战争是走向欧美式近代立宪之路的日本与中华帝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修改后这段表述被删除。但“市贩本”在记述“日清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的原因时,却明确地表述道: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日本都大获全胜,日本获胜原因之一是,“日本兵是由愿为本国献身的国民组成的”。在书中,那些受到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严重毒害而成为侵略者、对邻国人民大肆屠戮的日本侵略军队的官兵们,都被美化成为“愿为本国献身的国民”。可以看出,这里著作者所宣扬的理念与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所流行的向邻国扩张、为天皇效命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日本吞并韩国,“白皮书”本的表述是:“1910年(明治43年),日本合并了韩国。作为实现东西稳定的政策,合并韩国得到了欧美列强的支持。合并韩国在保卫日本安全和满洲权益上是必要的,但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未必带来了利益。在合并韩国的

《新历史教科书》,第185页。

同上书,第218页。

当时,日本是遵照国际关系的原则合法进行的。”经过修改,在“市贩本”中此段被表述为:“日本政府认为,合并韩国在保卫日本安全和满洲权益上是必要的。英国、美国和俄罗斯三国彼此警惕对方扩大对朝鲜半岛的影响,认为日本合并韩国可以实现东亚的稳定,因而没有提出异议。1910年(明治43年),日本行使武力,压制韩国国内的反对意见,断然实行了合并韩国。韩国国内也出现接受合并的声音,但爆发了激烈的抵抗运动,担心丧失民族独立。此后,韩国坚韧不拔地开展了要求恢复独立的运动。”

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该教科书只字不提日本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对中国侵略的逐步扩大,反而指责为“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但因受到通过暴力实现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日趋过激。对于不断扩大势力的日本,中国抵制日货,袭击日本人的排日运动变得十分活跃。”并且,书中还刻意渲染所谓的1927年国民党北伐军队在南京“袭击外国人”事件、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最为宽大的态度”、日本国内对币原内阁对华“软弱外交”批判的声音的高涨等,试图以此说明日本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原因。不自我反省自身的侵略战争责任,而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救亡运动横加指责,这是一种十分荒谬的历史认识,其目的不言而喻是想通过颠倒的因果关系、混乱荒唐的逻辑,把历史的本来面目搅弄得混淆模糊,并由此为日本国家开脱侵略战争罪责。

九一八事变在日本国内的历史教科书中一般被称作是“满洲事变”,它是由侵入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挑起的意在为

《新历史教科书》,第240页。

同上书,第263页。

同上书,第264—265页。

日本扩大对中国东北地区侵略制造借口的阴谋,这是今天世人皆知的历史事实。虽然《新历史教科书》承认了日本侵华当局的这种阴谋,在书中写道:“1931年(昭和6年)9月18日午后10时20分许,在奉天郊外的柳条沟,满铁线路被炸,关东军说是中国方面干的,立即占领了满铁沿线的城市。但实际是关东军自己进行的爆炸,这成为满洲事变的开始。”但是,当其记述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后所做出的报告书时,却又写道:“国联向满洲派遣了以英国的李顿为团长的李顿调查团。该调查团的报告承认满洲发生的不法行为使日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承认了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其实,当时的国际社会和李顿调查团都认定日本挑起的九一八事变及随后对中国东北广大领土的武装侵占,是违反国际法准则的非法侵略,并未有任何国家认同于日本对中国东北领土的侵略行为。但该教科书无视这一历史事实,蓄意捏造,硬以“莫须有”的手法,借报告书的名义,把日本国家军队对中国神圣领土的非法入侵说成是什么因“日本的安全受到了”“满洲发生的不法行为”的威胁而实行的“自卫行为”,企图混淆视听、狡辩推诿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对于由侵华日军当局在被其侵占的中国领土东北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书中则以满含溢美的笔调记述为:“满洲国以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为口号。通过日本重工业投资等获得经济增长,中国人的流入也显著增加。”这不仅是在歪曲历史,而且更是在公开地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正当化日本对中国人民实行的残酷的殖民统治了。

《新历史教科书》,第266页。

同上书,第268页。

同上书,第268页。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导因,该教科书不顾这些年来中外学者大量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不考察当时日本国家长期以来策划全面武装侵略中国、以期实现其独占中国的企图,却在“第一枪”问题上故意态度暧昧地记述道:“1937(昭和12年)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不知何人对正在演习的日军开枪的事件。第二天早上,驻守在这里的国民党军与日军之间进入战斗状态(卢沟桥事件)”,因而引发了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通过这样的记述,很容易在日本学生中间造成一种是由于中国方面“向日军”开枪、中国军队进入“战斗状态”的敌意行为而导致了事态恶化的印象,从而把挑起战端的责任推给了中国方面。同样,在随后的关于上海八一三事变的记述中,该教科书又以同样的手法写道:“同年8月,在外国权益集中的上海,发生了两个日本军人被杀事件,因此立即开始了日中之间的全面战争。”从它的这种记述中,人们不难看出,书作者有意识地要把挑起中日全面战争的责任全然推卸,从而否认日本国家长期以来一贯的对中国的侵略企图和实践的历史事实。

对于日本国家军队对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无以数计的极端暴行,该教科书则极力加以淡化、否认或辩解。该教科书中,只是以“日本军队使民众中也出现了许多死伤者”、“杀害了许多中国民众”、“日军造成的死伤人数也很多”、“出现了日军强迫当地人从事残酷劳动的事件”等只言片语一笔带过日本军队对亚洲各国人民所实施的无数的非人道的战争暴行,而对近些年来备受世人关注的七三一细菌部队、日军强征亚洲各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强制劳工、三光政策等等,则更是绝口不提一词。对于侵

《新历史教科书》,第270页。

同上书,第270页。

华日军残酷杀害 30 多万中国军民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该教科书极力加以否认,甚至在全书中连“南京大屠杀”的字样都未出现,而只是轻描淡写地称之为“南京事件”。在该书送审“白皮书”版中,对此是这样表述的:“东京审判法庭认定,日军在 1937 年发起的进攻南京的战斗中,杀害中国民众 20 万人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南京人口是 20 万,在日本进攻一个月后增加到了 25 万,除此之外该事件还有许多疑点,现在还在继续争论。因为是战争当中,即便是发生某些杀害事件,也不是大屠杀一类的问题。”经过日本文部省的审查后,该书“市贩本”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记述修改成:“日军认为,如果攻下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蒋介石就会投降,于是 12 月占领了南京(这时日本军队使民众中也出现了许多死伤者。南京事件)。”“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 1937 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许多中国民众(南京事件)。同时,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数据上也有一些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至今争论仍在继续。”近 20 年来,日本国内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论调甚嚣尘上,弥漫于日本政界、学界,该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正是这种论调一脉相承的继续。

二 美化侵略战争、宣扬错误史观的历史教科书

《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国家近代侵略历史蓄意做出歪曲事实的记述,一方面是该书的作者们以其一贯坚持的荒谬的历史观为出发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日本的青年学生和日本国民中间大

《新历史教科书》,第 270 页、第 295 页。

同上书,第 270 页。

同上书,第 295 页。

力宣扬这种荒谬的历史观。

在该历史教科书中,书作者公然宣扬战前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核心理论统治日本国民意识半个世纪之久的“皇国史观”,有意识地充当军国主义的还魂之尸。在该书的第一章“原始与古代的日本”中,著者把原本子虚乌有的神话故事当作历史写进了教科书。书中记述,在混沌初开时,一对男女之神交配后生出的孩子分布在淡中岛、四国、九州岛、对马、佐渡岛、本州岛等8个岛屿上,统称“大八岛国”,这就是日本国的诞生。并把传说中的日本天皇的祖宗之神天照大神的诞生、传说中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事迹等神话故事同样当作历史一一写进了教科书,并在书中地图上标出了神武天皇东征立国所经过的路线。这种说法,在战前日本国家实行天皇制军国主义教育的年代里,是被当作历史教授给学生们的。此番该教科书的著作者有意识地把神话等同于历史,其用心自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要在青年学生中再一次树立起天皇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之苗裔的信念,宣扬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皇国的历史观和国家观,宣扬日本人都是神的后代子孙,大和民族是亚洲乃至世界上的至优的族类。而恰恰是这种历史观和国家观,在战前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和侵略扩张政策的正当化,导致了日本国民对亚洲各国人民的极度蔑视和日本军队在亚洲邻国的土地上肆无忌惮的残忍施暴。

书中还全文刊登了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这一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标志性圣旨,赞誉它是“近代日本人的性格脊骨”,并对之进行了注解。其用意明显在于想重新在现代日本国民教育中

《新历史教科书》,第60—63页。

同上书,第36页。

同上书,第215页。

推行战前军国主义教育纲领,复活战前日本国家意识,重把日本现代国民的思想和行为纳入战前的极具封建忠君效命同时具有典型的军国主义思想特征的道德行为规范中。

关于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和日本的战争理念,该历史教科书中写道:“战争初期,日军打败盟军,为长期处于欧美殖民统治下的亚洲各国人民鼓起了勇气……日本为要求亚洲各地区国家对战争提供合作,同时也为显示亚洲各国的团结,于1943年11月召集该地区代表汇集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会议通过了提倡各国独立自主、合作发展经济、消除种族歧视等内容的《大东亚联合宣言》,明确了日本的战争理念。”日本方面宣告,战争目的是自存自卫和将亚洲从欧美统治解放出来,进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且,书中还把亚洲各国战后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等国的相继独立归功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些地区从战前就有要求独立的动向,其中日本军队的南下也成为亚洲各国加快独立的一个契机。”这种表述,彻底隐瞒了“大东亚共荣圈”背后日本对各国人民的残酷的镇压和血腥的殖民统治,把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完全美化成“解放亚洲”的战争,把作为侵略者的日本美化为亚洲各国人民的“救星”。显而易见,该教科书的著者是在毫无掩饰地鼓吹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反动思想,其口吻简直与当年日本侵略战争的指导者们如出一辙!

在对日本发动侵略的历史进行全面的否认、歪曲、美化的基础上,该教科书进而蓄意混淆战争的性质,企图在日本青少年中散布一种极端错误的战争观念。

在送审的“白皮书”中,书作者把战争的性质表述为:“战争是

《新历史教科书》,第277页,280页。

同上书,第281—282页。

外交的手段,是政治的延伸。有时是一种政治游戏。”战争是悲剧。但战争难以分清善恶,它不是用哪一方正义、哪一方非正义可以说明的。国与国之间因为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且无法以政治手段解决,作为最终的解决手段,就发生了战争。”在这里,书作者本意是想彻底模糊战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界限,混淆关于战争性质的是非观念,而这种观念的源头,正是战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理论的基本理念。因为,当战争不再被认为具有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时,它就沦为殖民主义侵略者和战争狂人们推行强权政治的有力后盾。教科书中这一段关于战争性质的表述最终在文部省的审查下被修改为一段不着边际、但绝不是对人类理性关于战争性质的观念认同的话语:“日本为什么与美国进行战争呢?……还是读一读特攻队员的遗书和当时的回忆录再来想一想战争中人们的心态吧。”

想通过明确的语言表述在教科书中直接地宣扬混淆战争性质、替军国主义的战争观张目的目的没有达到,书作者便对日军海外极端暴行进行轻描淡写的记述之余,不惜笔墨地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史及日军的极端暴行狡辩:“在迄今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而未杀害或虐待过非武装人员,日本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日本士兵和平民牺牲。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侵入满洲,在对日本一般平民进行杀戮、抢劫和殴打之后,将包括俘虏在内的60万人掳至西伯利亚,强迫从事苛酷劳动,致使近10%的人死亡。美军对日本进行狂轰滥炸和投掷原子弹,也造成巨大人员伤亡。”该教科书中全面回避“侵略”字眼,把日本国家在近现代史对亚洲各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行为一概表述为“进

《新历史教科书》,第279页。

同上书,第288页。

入”、“进攻”或“进出”，却反而把苏联红军作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主要力量之一而进军中国东北地区歼灭日本关东军的行动指责为“入侵”；闭口不提日本侵略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犯下的无尽暴行，却对盟军对作为侵略国的日本的军事打击横加指责，把日本标榜成为一个受害国，其混淆战争性质、宣扬荒谬历史观念的意图可谓昭然若揭了。

此外，该右翼教科书中还充斥着诋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企图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后对日本国家战争罪行的审判，为日本战犯喊冤叫屈，夸张现代国际关系紧张局势，鼓吹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许许多多的谬论。可以说，这样的一部教科书，是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否认侵略战争罪行、推卸侵略战争责任、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宣扬皇国史观等各种论调的集大成之作。它之被文部省审定放行，是日本政府关于其本国侵略历史之错误认识、日本社会右翼势力膨胀的典型表现。

三 反映战后日本国家历史认识的历史教科书

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社会在如何看待日本国家自近代以来对中国、朝鲜等亚洲邻国所发动的武装侵略战争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存在着严重问题、根本不能为曾经受到其侵略过的亚洲周边国家所接受、同时也不被国际社会所认同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的历史认识的实质内容就是，日本国家至今仍认同、庇佑着战前战时的军国主义皇国史观，不承认侵略战争性质，不承担侵略战争罪责，不妥善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不反省自身的历史错误。

《新历史教科书》，第 272、284 等页。

此次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核放行的《新历史教科书》,肆意歪曲历史事实,公开美化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各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极度淡化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及日军所犯下的极端暴行、大力宣扬皇国史观和侵略有功论,公然为曾经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军国主义举幡招魂。而这一切,正是与战后日本国家在处理与其在近代史上对中国、朝鲜等亚洲邻国发动长期的侵略战争相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三不态度——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不承认侵略历史、不承认战争罪行、不承认战争责任——相互一致的,正反映了战后日本国家关于其近代侵略历史认识的主流论调。

战后日本社会的这种错误的历史认识,有一个长期发展和表现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初期,以美国为首并为主体的盟军占领日本,GHQ对日本执行了严厉的占领政策。日本政府虽然迫于战后的形势,并按照GHQ对其所发出的一系列“指令”,废除了绝对主义天皇制度,重新制订了民主主义的和平宪法,清除战前和战时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及其势力,废除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改革国民教育制度,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对其侵略历史的反思和对其侵略罪行的承认。但即便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也表现出了对GHQ占领政策的不满和抵制。20世纪50年代,军国主义思潮在日本政界重新抬头并开始逐步泛滥。以文部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的某些重要部门对战后日本教育改造表示强烈不满,恢复战前和战时的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宣扬皇国史观,掩饰日本国家侵略历史事实,推卸日本国家战争罪责的企图日益明显并开始付诸实践。60年代,日本教科书问题发端,家永三郎编著的记载了日本近代国家的侵略历史的《新日本史》,于1962年被日本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被要求将其中涉及日本侵略历史的

记述进行修改。由此,战后日本国家和政府掩盖其侵略历史事实、推卸其侵略战罪责的企图通过作为日本政府之一重要组织部门、同时也以手握教科书的审核职权而对日本社会的国家观念及历史认识起着指导作用的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审核意见完全暴露。家永三郎作为战后日本社会中有历史责任感、能够正视日本国家侵略历史的史学家和正直人士的代表,于1965年以绝大的勇气将文部省推上被告席,从而拉开了长达32年之久的家永三郎历史教科书诉讼案的序幕;70年代,以铃木木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学者和作家,以全盘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为起点,开始明目张胆地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则更显露出日本社会对日本国家侵略历史认识的重大变化。

进入20世纪80、90年代,日本社会关于其国家侵略历史的认识更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日本国家对受害邻国虚言搪塞,言不由衷,在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上采取了“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的顽固立场,日本政治严重右倾;政府内阁的许多重要成员时时发表否认日本国家侵略历史、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历史及其对亚洲国家实行的殖民统治、否认日军暴行的言论,有规律地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文部省也多次掀起篡改历史教科书、掩盖日本国家侵略历史的高潮;日本法院系统也企图借司法裁判权,利用法律的名义,对大量的受害国的“慰安妇”、强制劳工、七三一细菌部队、无差别轰炸等等日军暴行受害者对日本国家或企业的起诉案件,不顾历史事实,蓄意谬判;日本右翼学者和极右团体的活动更是猖獗,他们从此前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局部否认,发展到公然宣扬“皇国史观”和神国观念,公然美化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散布侵略有功理论;日本企业界和财界对右翼团体歪曲历史之行径也给予了力度越来越大的经费支持,日本国内一些重要媒体为军国主义思潮勃然复兴和右翼势力的猖獗活动而摇旗呐喊;而在进入21

世纪的第一个年头里,日本文部省置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和国际社会舆论的严重谴责于不顾,公然放任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着严重问题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尤其是扶桑社出版的全面否认日本国家侵略历史、美化日本国家近代侵略战争、明确宣扬皇国史观和神国观念的《新历史教科书》出笼,更表现了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所坚持的错误立场。

通过国家认定的在国民教育中传播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的历史教科书,正是一个国家历史认识的载体。对此次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和其他的7种在对待日本侵略历史的认识上严重倒退的历史教科书的编著和最终获得通过、允许出版,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众所周知,教育事业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大事,它负有着普及先进的文化知识、传播文明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宣传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培养国民综合素质、造就未来国民的重大使命。任何国家,不论其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异,国民教育都是政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和任务,这一点在日本同样也不例外。教科书既是文化知识、思想观念的物质性载体,同时也是国家向其国民、尤其是下一代未来的国民传播知识、灌输思想观念、宣扬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根本媒介。历史教科书作为这种文化载体和传播媒介之一,负有着向本国国民传播本国或世界历史知识、宣传本国优秀历史传统和人类进步的文化理念、向本国国民输入正确的历史观、从而增养国民的现实责任感和合乎人类智性的文化观念、处事理念和道德信仰的重大使命。日本文部科学省作为日本政府的一个重要的部门机构,根据其本国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对其国家各类学校所采用的教科书所进行的审定工作,正是一项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政府行为。然而,在战后50多年来,日本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工作始终潜藏着一种反映着日本政府的错误历史认识的以否认侵略战

争、淡化战争罪恶、推卸战争罪责、宣扬皇国史观为其突出表现的企图。此次《新历史教科书》事件,正是日本政府这一企图的明显暴露。它再次明白地提醒我们要密切地关注日本政府对其侵略战争的认识究竟是什么、日本政府希望而且正在切实推行的国民教育方针究意是什么、日本政府希望其国民接受和认同的历史观究意是什么、日本政府及其政要多次做出的反省侵略战争,向受害国家及其国民由衷道歉的立场究竟有着多少诚意、日本国家的和平发展道路究竟还能坚持走多久多远、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最终重新完全得势并再次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的日子究竟会离我们还有多远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时,此次历史教科书事件也向世人表明: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在日本社会中始终存在着的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已经伴随着日本国家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内经济力量的壮大、日本政府的纵容和部分日本国民的默许,重新壮大起来,形成一股在当今国际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最为反动的、倒退的力量,其所掀起的波澜和逆流已经到了足以对亚太地区安全产生严重威胁的程度。

四 战后日本国家错误历史认识成因之简析

战后日本社会对其侵略历史的错误认识,是有着历史基础、思想基础、国际环境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是与战后几次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和不久之后其对日政策的改变以及日美同盟关系的确立和固化、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和军国主义思想的不彻底清算、战后日本国家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重建过程中对各种有利因素的充分利用、战后日本国内经济的恢复及其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近期日本国内大国主义思潮的

盛行及经济状况的不景气和政治局面的动荡,以及亚洲邻国对日本之这种趋势的发生发展相对无力的应对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在这诸多的因素之间,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因素,是促成战后日本国家错误历史认识形成和定型的重要原因:

首先,自明治时代起深入渗透到日本社会各个层面的神国观念、皇国史观、绝对主义天皇制观念、恃强凌弱和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侵略观念,其不仅在战前和战时上升为日本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而支配着整个日本社会,而且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也一直得到日本国家统治阶层的深深认同。也就是说,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理论是自明治时代而迄于今日日本政府及其官僚们一贯坚持不放的基本理念。这一点,我们国内的学者以往似乎很少有人明确地提出,但日本国内的一些进步学者即非常清楚地指了出来。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不会再对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国家在对待其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上顽固地坚持错误观念感到不可理解了。战前、战时日本国家的历史教育和历史认识实况,已为诸多学者加以深刻研究和认识,这里姑且不谈。战后日本国家和政府在对待其历史认识问题上所采取的作法,同样也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战后主导日本国家政治走向、指导日本国家历史教育方向的日本政府部门及其政客们,在处理历史认识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观念,与明治时代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理念的炮制者们及侵略战争时期的日本国家的战争指导者们所遵

2001年7月11日,鎌义文和《日本战争责任资料》总代表荒井信一等日韩学者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进行学术交流。他们二人在会上非常明确地指出,皇国史观、日本神国观念和军国主义是战前、战时和战后日本政府一贯认同的观念,100多年以来从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奉的思想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一批政府部门、内阁官僚,其手中握着政权,执掌着教科书的审查大权,支配着媒体宣传的导向,他们客观上有能力、主观上也乐意按照自己所一贯认同的思想观念来看待历史、来向日本国民传输错误的史观,并从整体上左右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

其次,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也是促成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国家错误历史认识的重要原因。这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虽然在战后初期 GHQ 对日本实行了严厉的军事占领政策,对日本社会的军国主义势力及其思想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算,对日本战前、战时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及纲领进行了大力度的改革,并主导督促日本统治者重新制订了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宪法以取代此前的绝对主义天皇制宪法,敦促昭和天皇发表《人间宣言》承认自己是人而不是现世神,对战后初期日本国民的思想解放和教育民主化的进程起到过非常重大的积极作用。但是,美国在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日本社会各个方面进行重大改造的同时,也就剥夺了盟国的其他成员国家对战后日本国家改造的参与权力,尤其是剥夺了近代以来饱受日本国家侵略之害的亚洲中国、朝鲜等国家对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行及责任彻底追究的权力。这种局面所导致的直接恶果之一就是,日本国家、日本社会无论是从心理上、观念上,还是从处理国际关系的实践上,都只归服于当时以强者姿态出现在其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美国,而对被其直接侵略伤害的亚洲邻国,既不肯服输,也不肯认罪。由此,其自明治时期以来藐视亚洲邻国的心态,在没有受到亚洲国家对其战争罪责的严格追究和清算的情况下,丝毫没有改变。因此,其对于自己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也就失去了进行认真反省的思想基础。

其二,天皇制度是日本近代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国家观念在国体上的根本凭借。美国占领日本,虽然破除了其自明治时代以来的绝对主义天皇制,但是,美国从其本国在太平洋西岸的战略利益及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出发,根据美国社会学学者的研究,采取了保留日本天皇制的作法,试图以此来达到美国战略利益的实现及占领政策在日本的完整执行。虽然战后日本现代象征天皇制与战时的绝对主义天皇制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天皇制的保留,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被免于追究,使得日本近代以来一贯的国家观、历史观的凭借并未被完全破除。尤其是在日本社会心理和日本民众心理层面上,天皇之得以保留,天皇之得以免除被追究战争罪责——也就是说天皇对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无罪责——具有着十分严重的象征性意义。作为一般的日本民众,多数人也无意去深究绝对主义天皇制与象征天皇制之间的本质差别,对他们来说,天皇还是那个天皇,他还是日本国家的象征,他还是日本国家的最高元首,他的每一话语,还是具有最高权威的敕语或诏书。这一点,可以从昭和天皇逝世时天皇广场上那万头攒动的场面及前些时候日本太子妃怀有身孕后第一次在公众媒体露面时所引起的全日本国民的轰动中透露得清清楚楚。而且,天皇制被保留下来,那么,作为这一国体制度之理论支撑的神国观念和皇国史观,反过来也便在战后重新获得了合理性。这一点,战后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及右翼势力也多方利用,作为他们散布荒谬的历史认识的重要手段。

其三,战后不久,随着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很快改变了对日政策。为了构筑起的针对共产主义阵营的防波堤,把对其俯首帖耳的日本作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嵌入其西太平洋环形防御链中,美国与日本达成片面性媾和,并对之采取了扶植庇护、重新武装进而互相结盟的政策。美国的这种政策性的改变,导致日本全

身心地投入美国人怀抱,并倚美国为强力靠山,其对亚洲邻国的轻视也就更显得肆无忌惮,再一次把日本自近代以来所表演的臣服强者、倚靠强者,蔑视弱者、侵略弱者的国家性格暴露无遗。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它的这种倚强凌弱的作法也是十分突出的。对于亚洲国家的批判、谴责,日本始终态度蛮横地采取不屑一顾、充耳不闻的作法。因为它已习惯于向作为强者的美国低头服输、不在历史问题及其他国际关系实践中与美国作梗,而对在它的眼中作为弱者的亚洲邻国则表现高高在上、满不在乎的态度。

再次,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及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也从物质的层面上对日本国家不顾亚洲国家的猛烈批判顽固坚持错误的历史认识提供了强力支持,为日本右翼大肆贩卖皇国史观、神国观念和歪曲历史、推卸罪责的活动打足了底气。虽然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进程因其错误的历史认识及其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不负责任的作法和态度等多方面的因素遭到很大阻碍,其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和军事大国地位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同样的原因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的抵制和反对而无法在短时期内实现其预期的目的,然而,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潜在军力的迅猛增加,不仅可以使日本国家获得在国际社会中以其经济的力量寻求其通过政治手段和军事行动所无法获得的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使得它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傲视周边邻国乃至世界,也即形成了作为日本国家观念之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认识的物质性的支持力量。这样,当日本与其邻国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发生对立的时候,当日本由于其错误的历史认识猛烈泛滥而遭到邻国批判的时候,日本政府往往不惜突破观念的圈子,动用物质性的力量,以经济性的手段向周边国家进行要挟,诸如停止经济援助、国会重新审议对某一邻国的某笔低息贷款之类,以维护其错误的历史认识。而这种作法

的结果,反过来会更加刺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宣扬荒谬历史观念和歪曲历史事实、推脱日本战争罪责的热情,煽动日本社会对这种错误历史认识的认同,从而与正确的历史观偏离得越来越远。

第四,战后半个或多个世纪以来日本国家错误的历史认识始终没有得到改正,也与日本相当广泛的社会力量对右翼势力及其宣扬的错误历史观念的默许、纵容乃至大力度的支持密切相关的。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时期,日本国民在军国主义国家观念灌输下,几乎全都狂热地投入到与向外侵略扩张有关的各项“事业”中。军、政、财界为战争推动者自不待言,文化界和理论界也成了鼓吹日本军国主义国策和法西斯主义的强力机关,向日本国民更进一步地灌输军国主义理论,为日本的海外扩张政策摇旗呐喊;乃至一般的普通国民,也推夫送子,参加日本向海外侵略的日本军队,关注着日军在海外的每一举动,欢呼日军在海外的每一次胜利,节食缩食,为日本国家的海外扩张军队捐输财粮。即在日本国家战败之际,圣战之梦破灭之时,日本国内居然还叫嚣着“一亿玉碎”的疯狂口号。当战争的尘埃落定,日本社会同样也没有表现出令曾经受到日本国家严重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满意的认罪和反省,加害与被害之间的本质界限,至今在许多国民心中仍然十分模糊。于是,当日本国家重新成为经济强国时,与日本社会由于其国家实力的提高而重新建立起的民族自负情绪,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日本国家错误历史认识观念得以广泛传播的广阔的社会土壤。尤其是财、政两界,屡屡运用它们握有的强大力量,从旁推波助澜,对右翼势力给予大力度的支持,从而造成今天日本国内进步力量与右翼势力此消彼长的恶劣局面。同时也使得日本国家抛弃其错误的历史认识、重树正确史观,妥善解决与亚洲邻国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获得周边邻国的谅解与信任变得更加困难。

此外,国际社会出于维护人类公义与共识而向日本所施压力

度的不足、亚洲邻国经济力量的不足与日本相抗衡、各国之对日外交方针由于各自的利益和策略的考虑而不能在对待日本社会历史认识问题上协作一致等等因素,也是造成日本国家在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上与周边邻国虚与委蛇、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顽固坚持错误立场并且有日渐恶化之趋向的重要原因,本文不能一一论列。

日本国家在对待其侵略历史上顽固地坚持错误的认识立场,其背后隐藏着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沉渣泛起并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的严重的现实性威胁,是日本政府与其国内右翼民间团体相为上下、互为表里的为其侵略历史的全面翻案,是日本国家行为、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合抱一体、联合一致的对中国等亚洲邻国的公然蔑视和挑战。因为,日本国家、日本社会对其侵华战争历史、对其侵略亚洲国家历史能否正确认识并传导给下一代国民,已不仅仅是一个纯学术性的问题,它更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它既作为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正常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而存在,同时又关系到日本社会能否主动而且有效地遏止曾经给中国等亚洲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军国主义的复活势头,关系到日本国家在未来的国际政治中的取向及其亚洲邻国的对应之策。总之,它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现实性地关系着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对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及其形成原因和危害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具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着深刻的现实实践意义。

(作者卞修跃,196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责任编辑:刘兵)